

华西坝在边疆服务中的协同与研究（下）

金开泰

（续上）

三、边疆研究

李安宅一直强调“研究服务训练要连合起来”，研究以服务为目的，服务必须以研究来推动，增加效率，达到目的。要扩大力量必须训练同工。尤其要训练边胞们自己能出而代之。(21) 边疆服务受到了五大学的重视，许多专家学者都投身其中，指导、考察、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华西人类学研究的繁荣。李绍明先生在“略论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中，介绍了它的形成、发展，特点。指出它兼收南北派所长，史志结合，对康藏地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南北派之上。(22)

1943年7月华西坝五大学与边部开会研究合作办法，拟定专人负责，拟具体章则。(23) 华西坝上的边疆研究，机构林立，刊物丛生，成果叠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亦多次举办报告会，特邀专家报告，各种刊物亦大量发表文章。边疆研究是这个时期华西坝学术繁荣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笔者在收集抗战时期华西坝的人物中就找到不少的例证。如：



华大葛维汉博士曾被聘为特约研究员，对羌民礼俗宗教研究是他的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到川西服务区，收集了大量资料。《边疆服务》上刊载的《羌民的宗教》是先生的调查所记。由齐鲁学生孙家俭译为中文。(24) 1948年他回国后，定居于科罗拉多州，继续利用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1954年史密斯索尼学院为他出版了《花苗的民歌与民间故事》，1958年又出版了《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系统地介绍了历史起源、语言、体貌特征、经济、技术和生活。先后获得过一个维京奖（Viking），两个古更赫姆奖（Guggenheims），其中一个便是1952年因为《中国西部有关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而获得的。

金女大教授刘恩兰多次进入川西区，对该区的地型、民族都有详细考察。她和学生们将这次考察结果写成论文，在美国享有权威性的《地理杂志》上发



表。这次考察纠正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完备地图上的一些错误。1941年她在边疆研究学会报告了《理番地理研究》（1943年发表在杂志第14卷B册）。1942年又报告了《气候和地理环境对部族社会风俗的影响》1944年发表在杂志第15卷A册上。1944年报告了《理番地区人类学调查》，同年在杂志15卷A册上发表《四川西北理番民族概况》。1944年华大博物馆为她出了《理番的民族》和《云南边民的生活》。1944年，她在理县一带进行地理学调查时，也在当地乡民手中收购了石棺墓的出土遗物。



金大教授马长寿，入金大前，1937年带领四川民族考察团，深入凉山彝区，考察凉山彝族的历史与现状，共停留145天，返回成都稍作休整之后，又到四川北部的藏、羌地区进行调查，直至年底才返回成都。在整理资料中发现现存资料仍有欠缺，便又率考察团于1939年12月再次深入凉山越西县田坝彝区一带进行调查，历时115天。1940年底撰写成《凉山罗彝考察报告》。1941年，马长寿先生又任凌纯声率领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组的川康民族考察团专员，赴四川西北以及西康东北部藏、羌地区进行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考察。先后发表有《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凉山罗夷的族谱》、《嘉戎民族社会史》，遗著有《凉山罗夷考察》、《彝族古代史初稿》、《氏与羌》等。



燕大教授外语系主任李方桂1943年寒假期间带着助教陈永龄和张琨二人到理番调查，那是嘉戎语的大本营。其后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上发表有《沙佛，藏汉语的元音》等论文。1944年及1946年应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有关贵州Li Ngan地区的歌》，《嘉戎人的语言》两次演讲。

燕大社会系主任林耀华1943年暑假考察凉山彝族，深入大小凉山彝族地区87天，以小凉山乌角、哨上一带为社区研究样本，进行语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制度、宗教巫术等方面的考察和体质测量，写成《凉山



夷家》。1944年夏，又赴西康北部，前后费时两个半月，调查康定、折多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藏民，曾亲自登门调查50户藏民家庭，对当地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发表了调查报告《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1945年夏，林耀华又带领其研究生兼职助教陈永龄对于川康北部交界地区嘉戎进行调查。重点为理县北部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等四土司地和理县以西九子、上孟、下孟、甘坡、杂谷五屯地。

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等论文并集成了《四土嘉戎》书稿。1945年4月他受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罗罗”的亲属体系》的演讲。



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在宥，1941年到汶川、理县一带作调查，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中发表《羌语比较方法》等论著。《川西羌语的初步分析》，《汶川萝卜寨羌语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三卷1943）在中央研究院所出的《人类学集刊》上发表的《摩西象形文之初步研究》，为‘羌语’范畴订出了蓝图”。1938年1941年两次

受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及《理番语言研究》的演讲。



华大冯汉骥教授1938年亲赴岷江上游羌区考察，历时三月，备受艰险，获取大量民族学资料，并在汶川萝卜寨清理一座石棺葬（SLM1），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之先声。1939年，他任当时教育部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社会组组长，进川康藏区调查，积稿十余筐，所发表的《西康之古代民族》仅其全豹之一斑。



金大的徐益棠教授1938年夏天，参加了刘国钧、柯象峰组织的西康社会考察团。共收集文物标本52件，拍摄照片283张。向西康建省委员会提供了书面报告材料，建

议大力普及教育，发展交通，振兴工业。1939年2月应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原住民》演讲。1940年夏，柯象峰和徐益棠分任边区施教团正、副团长，率20余人赴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社会调查，形成《雷马屏峨纪略》一书。考察结束后，他又考察了雷波小凉山地区，收集了民族学文物数百件。



东吴大学到华大的生物学家刘承钊，1938年到1944年在华西10年间11次在川西以横断山系为主的地区进行考察，行程8000余公里，为他的名著《华西两栖类》集累了宝贵的资料；1943年带领的生物标本采集组五月二日随昭觉巡回医闻组从西昌出发，经大兴，悬参坝，保保沟，一路采集，到了昭觉，刘承钊教授受凉而一病不起，后转为斑疹伤寒有生命之忧，不得

已返西昌。(25)



华大生物系张明俊教授曾同郭友文、刘承钊教授等人，多次深入川西北高原的松潘、茂县、汶川等县和康定、雅安，以及川西一带，对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各种植物资源，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采集到包括活熊猫在内的各类动植物标本数千件。他从加拿大引进苹果优良品种金帅、黄皇后，在成都地区试验培育，效果欠佳。后将百余株移到气候、土壤、水分适宜的茂汶地区试种，并几经改良，终于形成了果实累累，果味香甜鲜嫩，色泽绯红光亮，下端有三个乳头状隆起，色、形、味非常喜人茂汶苹果。其后茂汶苹果扩大到阿坝州各县及凉山州部分地区种植。

华大生物系讲师胡秀英亦多次到川西北考察，1941年1942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分别报告了《理番植物研究》、《嘉绒人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侯宝璋教授在川西区曾利用暑假到汶川、理县、杂谷脑一带作黑热病调查，写出了《汶川理县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病症》(26)

陈耀真、汤佩英等1944年暑假呈准中国盲民幸福促进会派遣赴川西北，就近治疗及调查研究，发表了《川西北眼疾调查之经过》。(27)

研究指导服务，总结服务，再指导服务。张伯怀发表了《边疆服务与写作》⁽²⁸⁾强调“关于边地的文物、风俗、礼节、人物的报告要不厌其烦”，一再鼓励写文章，因此在边部同工中亦有调查研究文章发表。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记述了服务区的现实状况或者工作中的发现，在边疆研究中也是难能可贵的。《边疆服务》《边疆服务通讯》为他们提供了发表园地，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川西区主任崔德润发表的《黑水三番旅行记》⁽²⁹⁾、《四土纪行》⁽³⁰⁾、《理番县的边务问题》⁽³¹⁾，强调边务绝不是纯恃武力，武力是不得已的消极手段，积极的必须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正确的作法。铭贤、华大教师、川西畜牧场长刘国士的《川西农业调查》⁽³²⁾、《川西小麦病虫害防治》⁽³³⁾、《川西小麦腥黑粉病防治区访问录》、《川西汶理两县小麦腥黑粉病防治结果调查报告》⁽³⁴⁾、《四川十六区麦病调查报告》⁽³⁵⁾；威州医院院长马锡山发表的《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佳山寨扑灭麻疹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实际研究。又如马鸿纲《傩傩的经典文学》⁽³⁶⁾，张宗南《萝菴寨羌民的端公》⁽³⁷⁾，《日尔觉寨的嘛呢会》⁽³⁸⁾等等。

还有当地人自己记述其历史更显真切。如傅正达（本名吉第依和）为一会理的夷族青年，小黑菁小学毕业后到云南神学校深造，已到边部工作两年，写了《夷人论夷务》⁽³⁹⁾、《宁属土司起源的故事》⁽⁴⁰⁾、《边民教育的几个主要问题》⁽⁴¹⁾；又如李仕安先生生长在夷区，受教育后又回到夷区，担任地方行政工作，写了《西康宁属概观》⁽⁴²⁾，介绍了当地的历史，直面夷区面貌，对于改进夷区的工作抱有极大愿望。又如出生在夷区，受过现代教育，边胞中杰出的领袖岭光电写了《如何接近夷人》⁽⁴³⁾、《对于边教的一点见解》⁽⁴⁴⁾强调同夷人接近首先要把夷人当人看，尊之，敬之。

此外郑象铤、傅懋勳、林名均、刘延龄等都各有研究的成果。

四、内边交流

1、组织大学生假期到边疆服务

边疆服务的宗旨：“使大学生利用暑假时光，从事边疆工作，籍以认识边疆情形，养成服务精神，促进后方建设，改善边民生活”⁽⁴⁵⁾ 1940-1945年暑假都组织学生到服务区参加活动。

1940年年初张伯怀即联络蒋翼振、崔德润、程玉麟、施如璋、芮陶庵等组成联席会，征集参加人员，3月12日截止报名。从375人中经过三次挑选，定

了 81 人。开始利用星期天训练，下分五组，每组由专业人执教与指导：农业组：章之汶、赵连芳、崔毓俊、丁克生；社会调查：史迈士、柯象峰、徐益棠、孙文郁、张伯怀、张世文、顾颉刚、陈家芷；医药组：于光元、毕天民、程玉麟、郭国珍、侯宝璋、刘延龄、启真道、杜大夫、刘荣耀；教育组：邵镜三、倪清源、鲍文年、崔亚兰、胡自贞、熊佛西、刘之介、傅葆琛、余牧人；宗教组：郭中一、饶合理、毕范宇、罗天乐、李美博、陈竹君、满恩溢、华琴声、夏敬亭。6.26-7.3 集中训练；26 日举行开幕典礼，主席张凌高，列席刘书铭，中央党部及省党部代表黄梦飞。几天中有 48 位教师、指导人员授课。饶沙白受邀讲家谱学方法。出发前吴贻芳校长又前来最后训话。服务团除团部外，共分九队，驻于汶川、威州、茂县、通化、理番、杂谷脑等地之县城、乡镇或寨子上。每队之组织配合医药、教育、农业、宗教、社会调查之各门人员而组成。有顾问团长、团副管理，川西服务区还派人指导，饶沙白在七队任顾问。团本部设在威州。团长蒋翼振、副团长崔德润、芮陶庵经常在各队巡查。7 月 6 日由蓉出发，8 月 22 日结束返校。21 日在沙坝巧遇于右任，诸同学请他训话，他以“禹王之勤于服务同胞”为题，还有许多同学请他题字，他虽忙于题字但极高兴。回校一月后在华西坝公演了那中国自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边寨戏剧——日尔觉寨。引起了数千观众的欣赏、惊奇、兴奋和赞美。(46)



同年暑期组织医疗服务团赴西昌工作，由齐大张滙泉院长、张伯怀院长率领，七月初出发沿途医疗，本院教员张冠英、陈兆仁大夫及高年级学生外，其他有中大教授二人，华大教授二人。于 8 月底返回。(47) 研究筹建巡回医疗队，深入夷区。筹建卫生人员专修科，培养当地人才。(48) 1941 年 6 月张汇泉代院长再到西昌安排建立中心医院。

1941 年暑假则由“教育部主办公私立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包括中大、金大、金女大、华西、齐鲁、边疆学校、江苏医学院、云大、艺专等九校。人数 90 人，其中教员 14 人。分为文化、经济、地理、农业、生物、医药卫生、

兽医畜牧七组 60 人和五个服务队 25 人。由教育部王文萱担任团长，崔德润为总干事，教育部拨款 5 万支持。7 月 7-13 日集训。14 日离开华西坝。调查工作区是岷江流域，杂谷脑河流域及黑水河流域。各组以调查为主，服务为辅；服务队分别驻在萝葡寨、威州、佳山寨、理番县城、杂谷脑，从事教育、医疗、宣传抗战。以服务为主，调查为辅。经过 50-60 天的工作，都有所获。如文化组在理县发现新石器，在威州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片；边胞歌谣的收集，语言的比较研究，风尚的调查均有所得。经济组对于各地农商经济作了详细的调查；地理组矫正了许多现今地图上对于城镇、河流位置的错误，对于地层构造的迁变，也有个正



确的结论。生物组发现一种世界上青蛙新种，两种世界植物新种。农业组发现了许多新的作物病虫害，且对于海拔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农作物有了详细的调查。医疗组诊疗千多个病人，对于死亡率作了科学的调查。畜牧组也诊疗了一些生病家畜，对于防疫选种知识的宣传，和医药组一样被当地人民所欢迎。(49) 回蓉后在华西坝陆续举办学术演讲，由各组长担任。1942 年 2 月 18、19 日在华大体育馆举办边疆文物展览会，展览标本有地质、地理、生物、文化等部分，内以地图植物与民族文物标本较为精彩，其中民族分布地图与羌民巫师服饰，法器标本最为珍贵。(50)

1942 年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共教授 4 人，团员 32 人，含华大、川大、金大、齐大、中大、金女大、燕大、华西神学院八大学，除在本部川西区作特别研究和巡回服务考察外，并至草坡等人迹穿到之处任特别考察。(51) 还与理县政府、边部合作，举办了一期“小学教师训练班”，为期三周。张雪岩、刘恩兰、栾汝璉、胡秀英等担任各科讲席。

1943 年 5 月 10 日 边部与华大博物馆、华西边疆研究所于在华大化学楼联合举办羌民文化演讲会和展览会。展览内容为羌区风光、羌民古物、羌民宗教与羌民生活四组，每组除实物外有照片和彩色速写数幅至数十幅。午后三时由

本部特约研究员葛维汉演讲《羌民的习俗》。(52) 这年暑期组织规模较小的服务队，由金陵神学院杨占一教授率领，团员共计 4 人，华西神学院学生 2 人，华大医学院学生 2 人，于 7 月 2 日到川西萝菥寨服务及调查一个半月。(53)

1944 年是西康区与西昌学生救济会联合，组织当地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暑期服务工作，包括：巡回剧团、巡回卫生队、夷民教育、儿童夏令学校、农业生产辅导、社会调查、乡村布道等。7 月 11 日分到各队，活动一个半月。(54)

1945 年组织的是凉山抗建服务团。训练工作三月。三月十日下午假华西大学会议室举行结束典礼，适西康刘自乾主席及西昌委员长行辕张伯常主任因公莅蓉，特请两公向团员训话。川康铜、铅、锌矿管理局长谢树英先生报告几位研究中国边疆的外国人的辉煌成就以及他个人在边地工作的经过，到会来宾，还有华西坝各大学校长及关心边疆问题的各社会学教授二十余人。三月下旬由张伯怀主任带领出发，深入夷区。团员分为两批于四月中旬到达西昌，各机关均热烈欢迎。岭帮正、岭光电及安树德土司，尤表欢迎。五月七日到达昭觉，全团十五人，分发美姑河、牛牛坝、黄茅埂等地工作。(55)



區夷進初生學大

在《救赎与自救》中，作者引用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边部档案中有一段称：“建议边部扮演一个能够联系“保保”，教会他们如何帮助失事的盟军飞行员，并指导实地救护工作的角色。”因此服务团“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指导保族民众战争知识，告诉他们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教会他们善待并救援因飞机失事坠落这一地区的盟军飞行员。”这便是该地区除诊病、注射外的一特殊工作。(56)

抗战胜利后，大学北归，经费困难，1946 年就已没有再组织学生赴边疆服务了。1948 年 2 月 6 日边部邀请在京参加过暑期服务团的人座谈，共同的意见是要有一个具体组织，开展活动，团结青年学生。最后公推张伯怀、朱传彝、许义均、万庆恩为组织筹务委员。(57) 后随着局势的发展，也不再有什么活动了。

2、组织边疆学生到成都观光

1945年春由川西区主任崔德润和干事萧乐儒带佳山寨小学生9人及妇女识字班8人一行共17人，3月31日到成都观光。总部邀中西人士50多人开欢迎大会，随后参观访问了女青年会的民众学校和托儿所、航空子弟校、中央日报馆，四圣祠医院、护士学校、华英书局、盟军医院；川大、燕大、齐大、金女大、华西神学院、四圣祠各部、高琦中学等盛情欢迎，相互热情联欢；在少城公园与成都市儿童共庆儿童节、出席盟军招待会、慰劳伤兵，在成都丝绸业公会的表演、教育厅看电影，暑襪街礼拜堂唱圣诗等活动；省主席张群、川

佳 山 寨 小 学 学 生



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省教育厅长郭守有、社会处长黄仲翔、十六专员王元晖、中央军校教官刘铨等也一一招待。这次观光成了羌民史上的一大创举，在成都“佳山寨羌民观光团”也传遍了大街小巷，是边疆与内地交流的一次高潮。在各种场合他们都表演了羌民的锅装，被赞誉为“我们的国粹，是我们的真正文化，值得提倡，值得保存”。崔德润主任也在各处报告边地工作概况及介绍佳山寨。互相接触与交流中开拓了眼界，学生们说“一切都好！”甜在心里，笑在脸上。对于他们的一生和边地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学校、政府、内地人士也增加了对边地的认识与了解，都说“籍这个机会让我们能有更亲切的机会了解，我们是一家人”。(58)

1948年4月6日边部约请有关机关及文化团体召开欢迎大会。欢迎川康夷族国大代表到京开会及夷族观光团到京沪参观。马长寿介绍边地情况，观光团的人说：“服务部和夷人的交往特别深，任何人都不如，夷人到了服务部就是到了家，你想这个家的意义有多深！”这或者是边部组织交流的尾声吧。(59)



茶 會 後 留 影 紀 念

五、启示

老实说边疆问题是长期形成的历史问题，要真正地解决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基督教或几个大学可以完成的，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中国基督教总会以华西坝为基地，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在川西和西康开展了服

务工作，尽管困难重重，或许仅仅是杯水车薪，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受到了各方的赞誉，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就大学而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整体国家观念，并能到基层为民众服务，因此各校都设置了乡村实验基地。1945年5月华大石羊场社会工作站两周年活动，刘龄久秘书、崔德润主任都参加。是日参加的文化团体、社会组织七八个。李安宅主任主持，说“我们这个工作是与边疆工作有关系的，我们的目的是：第一步训练大学生肯到乡间去；第二步便到边疆去。”崔主任说：“我们在边疆工作好比地下凿井，是靠井上的人供给我们各种材料，是相信井上的人不会把我们放下去就不管了，今天到会的专家学者都是井上的人，都是我们的后台。”⁽⁶⁰⁾服务区可以说是华西坝各校共同的前台实习平台。这前台和后台的联合，既为学生树立整体观念，又提供了实习场地，几年中有各校自愿参加的有300多人，对学生也是极好的锻炼。1940和1941年的两任团长蒋翼振、王文萱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有大体相同的印象。如训练了吃苦耐劳，学到脚踏实地的人生哲学；了解社会，发现边民的仁爱敦厚，更爱和努力服务祖国，服务边民；充实大学的内容，既增进学问知识，又促进社会的进步等。蒋翼振特别说：边疆归来果然带了一点蛮气，但在此种蛮气中有节操，有热诚，有健康，有坚忍不拔的排山倒海的气概，能在绝望中仍然继续奋斗以再生，能在前途黑暗的大地上透视到且把握住那确实有的而且必要来到的光明……

同时也为华西派人类学的学者进行研究，建立了实在的观察点，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对该学派的形成起到了基础作用。华西人类学派在这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疑是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繁荣的最大亮点。而且通过实习与研究，取得的许多见解也是正确处理边疆问题值得思考的宝贵经验。

服务区对边疆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黄炎培在全国委员会上说：边疆应办的事情千头万绪，不只一端。然而由官吏去办往往不能收效。要一个第三者负起责任。本会过去数年，先从医药着手，现在边民对于西医的信仰，甚于中医，边民如有疾病，而经治疗，则其信服，甚于一切，如教育文化等工作，就可以随之着手，边民一定没有反感。钱由政府出，工作本会做，较之政府直接办理，我敢断言“定用钱少而成功多”。⁽⁶¹⁾

服务区的工作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总会干事高瑞士考察服务区后说：

“我对于边疆服务工作的观感”中说：参观川康两区，作者乃深切了解本部同工工作地区之偏僻与凄凉，工作使命之艰巨与伟大。表现着基督教的真精神——不为困难所屈服，不为罪恶所诱惑。他们优良的品行，自我牺牲及严格的自律，令人深感敬佩！（62）（在经费方面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支持。39、40年开办时全靠中央补助，41年开始收到一些捐助，42年达五分之一，43年达四分之一。（63）（远在沈阳的瞿目重明女校，一批自称“被幸福摒弃的女孩子”也致信，甘愿从日常需用中省下几个小钱送给服务区。而且，随着服务的进展，边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热情和能力也增强了，“授人以渔”才是真正的服务成绩。

边疆服务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抵御外侮，各民族更要团结一心，强固国家。从顾颉刚的“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千山不隔，万里一堂，团结起来强更强。”到李仕达回北京一先生的信所说：“我们觉得民族应当平等，僮夷是中华民国的一族。边疆服务部的工作，就是本着“爱人如己”的道理，彰显上帝的慈爱，表证基督的救恩，以牺牲服务之精神，来改善夷胞的疾苦生活，使之日趋进步，日臻文明。”（64）边疆服务工作取得了边民的信任与赞赏，增进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同工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当地的赞誉。1948年到南京的夷族观光团代表说“在西昌一带没有不知道边疆服务团的，他给我们夷人的好处太多了，医院治好了很多的病人，学校教育了我们的子女，处处为我们的福利着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们呢？”傅正达说出夷民的教育、医药卫生和和改善农业生产技术的呼声，说如果这三个愿望都达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所谓“夷务”问题自然解决。（65）

若是真能全方位，长期不懈，那边疆内地差异性的缩小乃至消失，内地与边疆融为一体，又各保持特色、传统的理想的愿望，或许真能逐步实现。

注释：（略）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 了王曙生先生、何溢先生的指导与帮助，特表谢意。）